

《论语》是中国伦理哲学的源头

□ 蒋述卓

十年前，我有幸在广州大学与屈哨兵教授一起参加了中华书局版的《论语心读》的研讨会，深深震撼于作者柳恩铭先生倡导弘扬原始儒学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矢志不移的坚贞和坚持。十年后，2024年的10月7日，应邀出席由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恩铭先生“四书心读”丛书首发式，有幸阅读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版的《论语心读》（上下卷），深深感慨恩铭先生的士人情怀和批判精神。作为忠实读者，我觉得作为“四书心读”丛书之一的《论语心读》更圆融，更厚重，更深刻，更富有洞见。有感而发，与朋友们分享阅读《论语心读》的一些思考。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揭示公元前500年前后，同在北纬25度到35度之间的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同时诞生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实现了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思想和传统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深刻影响人类的生活。而且每当人类面对不可抗拒的困难、困惑、困境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深情回望这个时代哲人的智慧。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中国诞生了孙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东方文明的代表人物。孙子开创了军事哲学，老子开创了自然哲学，孔子创建了人本哲学，墨子开创了工匠传统，孟子开创了民本政治，庄子开创了自由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基因和核心密码。

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汉代被迎合皇权的董仲舒改造为维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的经学；在宋代再次被程颐、朱熹加持为维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的理学。时至今日，人们依然称汉代儒学为儒学，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学，结果导致原始儒学的人本思想、民本政治、生本教育的本真逐步淡出，甚至被遗忘。而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则奉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辜恩铭第一个将《论语》翻译成英语，此后数十个《论语》的英语版本，要么尊宋儒，要么尊汉儒，却没有一本译介原儒精神。这导致西方世界一直以来为儒学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君臣纲，夫妻纲，父子纲”，就是“三从四德”，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误认为女人裹小脚、男人留长辫都是儒家的套路。返本而全面认识先秦儒学精神的中国人很少，国外对于先秦原始儒学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之精神也知之甚少。这在文化史上的确令人遗憾，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今天文化自信的障碍。

为什么两千年，人们愿意被汉儒误导而不能觉醒呢？首先，源于汉代以后很多读书人误以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开创大汉雄风。事实是没有黄老之术与原始儒学并用的文景之治，没有文景时代以民为本的休养生息，没有不与民争利而储备的丰厚物质基础，就不会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底气。汉代的繁



山东曲阜孔子像 图/视觉中国

王权的合法性；李唐王朝尊崇佛教，唐太宗支持玄奘西天取经，安顿人心并企图以佛教加持皇权的稳固性；李唐王朝还按照原儒民本精神治理国家，让国家有足够的空间、资源生息繁荣。盛唐气象甚至是源干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和繁荣滋长。唐代都城长安，人口以百万计，世界半数以上的国家民族在长安留下了足迹，长安的繁华类似当代纽约。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其实也是思想解放和多元文化的结晶，跟汉代儒学丝毫不相干。

为什么宋代理学能够误导中国千年而不被人觉察？那是因为少数觉醒者如王阳明、李贽等无法叫醒装睡的人。宋代理学，以“理”代替了权力。天子以“理”维护自身统治，官员以“理”谋取私利，长者以“理”维护尊严，男人以“理”维护特权。理学成了实实在在维护皇权、父权和既得利益的工具。既得利益者谁不醉心？谁不喜欢？谁不迷惑？程颐、朱熹开创的理学备受皇权和各类既得利益者青睐，自在情理之中。但程朱理学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却是陷阱。在理学陷阱中，元代知识分子跪着求生存，清代知识分子苟且偷生；而普罗大众则因此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血液中注满奴性，没有做稳奴隶的争取做好奴隶。满清末年四万万同胞觉醒者不多，铁屋子沉睡的人不少，而装睡的人也很多。清朝如何不亡？

原儒和汉儒、宋儒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论语心读》作者恩铭先生认为，原儒根本特质在于原儒是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

首先，原儒主张以人为本，强烈的人本意识，鲜明的人本精神，就是原始儒学的本质特征。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其价值链条是五张羊皮可以换一个奴隶，五个奴隶可以换一匹马。在《论语·乡党篇第十》却分明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适逢孔子退朝，孔子关切地问：有人受伤吗？不问马是否受伤。《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人以陶俑陪葬，温文尔雅的孔子居然骂粗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用现代话来翻译就是，最先用陶俑陪葬的人，他断子绝孙啊。原始儒家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竟至于此，其人本精神如此厚重浓烈，遗憾却被汉儒、宋儒抛弃殆尽，汉儒、宋儒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神权、皇权、父权、夫权、男权和既得利益。原始儒学是伦理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哲学，是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修养身心的哲学，而不是维护特权的工具。由此可见，汉宋两代儒学与原始儒学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原始儒学政治上以民为本，而汉代儒学以神为本，宋代儒学以理为本。孔子儒学的实践基础是周初的政治实践和礼乐文明。《论语·尧曰》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百姓；如果百姓有错，责任在我）何其高尚的境界，何其强烈的情怀，何其勇敢的担当！更早的《尚书·康诰》说出了“天命靡常”（唯独天命不会永恒）的意思。为什么？《尚书·泰誓》给出了答案：“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所看到的来源于人民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来源于人民听到的）周代统治者，正是在颠覆商汤政权的过程中，发现了“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意”的惊天秘密。原始儒学认为，所谓政治是让民众像蒲草和芦苇一样繁荣滋长，如此，社会经济文化自然走向辉煌。而汉儒宋儒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治理则鼓吹以皇恩浩荡泽被人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滴灌式的社会治理。人民作为主体自觉和自然发展与皇恩浩荡的涓涓滴灌，哪一

种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还需要解释吗？

再次，原始儒学教育上以生为本，汉宋两代儒学却以师为本。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读过《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堂课充分体现了先秦儒家以生为本的教育哲学，课堂教学模式类似于今天欧美的自由讨论，全过程体现了教学民主、因材施教、思想自由的教育趋向；这堂课中折射出的师生关系，即孔子之于学生如师如父亦师友亦知己。而汉人重新构建儒学后，师生关系变成了冷冰冰的“设帷讲学”，课堂之中，师生之间连面都见不到，更遑论教学民主、思想自由；到了程朱理学时代，师生关系变得更加畸形，学生对老师常行跪拜之礼。从哲学思想、政治智慧到师生关系，原儒和汉儒、宋儒可谓天壤之别，假如没有以生为本的自由、民主的孔门教育，很难想象有《论语》这部旷世著作传世。

除了人本伦理、民本政治、生本教育的根本区别，原儒与汉宋儒学在伦理价值中也几乎完全对立。比如“忠”的伦理，在孔孟儒学当中，就是恪尽职守，别无他意。孔子周游列国，与国君一言不合则拂袖而去，哪里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比如“孝”的伦理，孔子儒家强调“父慈子孝”而互为条件，到了汉代以孝治国发展到“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荒唐，宋儒更是以“理”加持“孝”，稍有不孝就被认为“天理不容”。比如原始儒家并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可是汉宋儒学把女人变成卑微的附属品。再比如，孔子主张学术平等，而汉宋儒学却极力主张学术专制。汉代“天子会诸侯讲论五经，作《白虎通义》”，无耻地开启了权力裁断学术的恶例；明代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教材，更是实现了程朱理学与皇权专制的同流合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原始儒学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的回归。而承载原儒精神最基础、最核心、最全面的载体，莫过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集体整理的语录体散文《论语》。《论语》是中国伦理哲学的源头，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底色，是中国价值体系基石。对原儒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挖掘最深刻、最系统、最全面、最富现代性的莫过于恩铭先生《论语心读》。

恩铭先生《论语心读》阐发的以人为本的哲学、以民为本的理念、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入世的传统、厚德载物的担当、天下为公的理想、尚中贵和的思维、博爱泛众的胸怀、家庭中心的伦理、家国一体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养护国人心灵的宝贵精神资源，也是我们今天在探索“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需要去仔细体会并付诸实践的。恩铭先生的《论语心读》所阐发的是以生为本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情怀、因材施教的方法、全面发展的课程、尊重个性的取向、慎独正己的修身、反求诸己的态度、积善成德的路径、君子人格的激励等，是中国当代教育应该和必须传承的最宝贵的教育智慧。

《论语心读》是生命激扬的清歌，让2000多年前的《论语》复活、鲜活、燃烧，燃烧出梦想、理想、信仰；《论语心读》恢复了原始儒家的责任和担当，倡导家国情怀和悲天悯人，倡导关心他人、关心族群、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倡导给宇宙以道德终极关怀；《论语心读》旨在唤醒原始儒学精神，旨在弘扬原始儒学本质是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旨在从根本上建立文化自信，旨在重建新时代的伦理价值体系而安顿人心。读懂普通的《论语》解读或许有困难，但是，阅读恩铭先生的《论语心读》却很容易。

荣是黄老之术与原儒精神滋养的成就，跟汉儒无关；导致汉代盛极而衰的恰恰是“唯我独尊”的汉代儒学。

其次，源于很多读书人误以为盛唐气象源于汉儒文化的滋养。事实是，盛唐气象恰恰源于儒释道并用。李唐王朝为了江山的稳固，捏造自己是道家创始人李耳的后裔，以增强

（作者是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本文是广东省社科联2024年专项委托项目“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研究”
(GD24WH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岭南三家笔下的古琴书写与精神内涵

含英咀华
□ 邱丽娟

“岭南三家”指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因岭南诗人王鼎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选刻的《岭南三家诗选》得名，是当时岭南地区最享盛名的三位诗人。他们不仅在岭南诗歌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琴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品格与岭南三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有着相似之处，加之清初岭南古琴文化日渐兴盛，古琴成为文人间雅聚交流的文化媒介。抚琴、听琴、品琴、创作琴诗和琴歌等成为岭南三家交游的重要内容。现存的岭南三家诗歌作品中有很多涉及古琴书写的篇目，其中屈大均近300首，梁佩兰近70首，陈恭尹近40首，古琴作为一个特有的文化符号意象，在被书写的過程中不断生成诗人的自我镜像，映射出岭南三家在时代变局中复杂多元的精神内涵。

以琴入世，慷慨悲凉的遗民情怀

《生生园十咏 其七 琴台》

南音的孤独悲凉，恰是自我写照。“况乃风高水波立，海隅咫尺非吾土。豹之斑，下人间，鶡之横，出深阻。掩君泪，为君吟。彼琴者木本有心，四海男儿何至今。”《崇祯皇帝御琴歌》同样是慷慨悲凉，与屈大均不同的是，陈恭尹因感怀身世与琴共鸣进一步生发出“木木有心”的感慨，人琴相通，物我两化。而梁佩兰作为岭南三家之中唯一仕清的诗人，其琴诗中的遗民情怀得含蓄委婉，“十年躁气此尽平，今夕始闻君子声”（《听唐人弹琴》）“天下和平不能外，古调于今少人爱”（《容栎堂鼓琴歌》）等琴诗中皆不见激越悲愤之气，加之梁佩兰又是三人中最精于古琴，痴迷于古琴的琴人，心性超然，使得其琴诗中更有一种不同兴亡的平和淡然。然而，诗中虽不直问兴亡，却仍能看出其对乱局的厌恶与排斥，对“天下和平”的期盼与热爱，骨子里仍是缠绕不去的遗民情结。

琴为心镜，诗为心像。细读岭南三家的琴诗，可以观照出他们以琴入世、感物思国，借他物言说自我的精神内涵。

以琴避世，无可奈何的逃禅隐逸

《罗翁八十有五善琴诗以赠之其一》诗中的“遗老”“故国”足以彰显其遗民情怀。再如，“我为园客丝，缠绵玉轸中。玉轸有时折，朱丝无断绝。大弦含幽兰，小弦吐白雪。鼓舞尽神明，庶以酬先哲。”《咏梁子六堂琴》这里，诗中之琴已是我形象的化身，诗人宁为玉碎，玉轸可折但“朱丝无断”。朱丝与“朱明王朝”暗合，意指诗人之忠贞恰如“幽兰”“白雪”般高洁。最能体现屈大均遗民情怀的是《烈皇帝御琴歌》，诗中叙述崇祯皇帝所弹御琴七弦在演奏中无故自断，遂兆国变，御琴从此流落民间之事，情感沉郁激昂，“我从李卿请琴观，楚囚相对泣南冠”余音绕梁何缠绵，满堂宾从皆涕泣。请君罢弹莫终曲，恐令南北诸侯哭。”该诗以琴事写人事，字字血泪，慷慨悲凉，其忠贞爱国的遗民情怀直透纸背。

与屈大均相比，陈恭尹、梁佩兰的琴诗数量虽少，但遗民情怀也蕴含其中。陈恭尹又因12岁丧母、16岁举家遭戮的不幸遭遇，其琴诗中的遗民情怀在国破家亡的沉痛之外，更有一种身世飘零之感。“莫上高台坐，南音不惯寒”



古琴文化 图/视觉中国

古琴本身就与禅宗有着天然的亲近，使得他们的禅佛思想在琴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屈大均的《弄琴有怀石斋翁》

以琴修身，觉知生命的自我圆融

《梁草堂庭律珠录》

梁佩兰出家的时间较短，但却是岭南三家中最具有佛性的。他随遇而安，易代之际，始终有一种“识时务”的独醒，因此也是三人中唯一仕清的。他自年轻起便常与僧人交游，访僧悟道，晚年更自称二楞居士，一心向佛，以弹琴、品琴、藏琴为乐。他的《容栎堂鼓琴歌》中有“何时山无车轮路，无马，官府民间两闲暇。老夫对客日微吟，饱饭弹琴树脚下。”字

身负国仇家恨、命运最为悲惨的陈恭尹，恢复故国是他一生的志向，但晚年也在复国无望的悲苦中逐渐消磨了斗志，接受现实，“身隐新朝”（陈恭尹《独瀛堂集》）。其琴诗也成为他的思想历程和精神演变的见证，从“木木有心”“南音不惯寒”的嗟叹悲愤，逐渐转为“一卷慵开独坐吟，不冠不袜坐松阴。天涯何患无知者，流水高山共此心”（《题静像·善琴》）的平和恬淡，进而再到“幽人何所有，虚室有清弦。素手偶为抚，秋心一渺然”（《弹琴》）的空灵幽幽，超然物外，已类佛家语。

身负国仇家恨、命运最为悲惨的陈恭尹，恢复故国是他一生的志向，但晚年也在复国无望的悲苦中逐渐消磨了斗志，接受现实，“身隐新朝”（陈恭尹《独瀛堂集》）。其琴诗也成为他的思想历程和精神演变的见证，从“木木有心”“南音不惯寒”的嗟叹悲愤，逐渐转为“一卷慵开独坐吟，不冠不袜坐松阴。天涯何患无知者，流水高山共此心”（《题静像·善琴》）的平和恬淡，进而再到“幽人何所有，虚室有清弦。素手偶为抚，秋心一渺然”（《弹琴》）的空灵幽幽，超然物外，已类佛家语。

岭南三家的琴诗，意在琴外，琴在世外。他们各有遭际却殊途同归，以琴避世、逃禅隐逸，是他们在政治风云席卷下的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

《梁草堂庭律珠录》

梁佩兰作为岭南三家之中最有佛性的。他随遇而安，易代之际，始终有一种“识时务”的独醒，因此也是三人中唯一仕清的。他自年轻起便常与僧人交游，访僧悟道，晚年更自称二楞居士，一心向佛，以弹琴、品琴、藏琴为乐。他的《容栎堂鼓琴歌》中有“何时山无车轮路，无马，官府民间两闲暇。老夫对客日微吟，饱饭弹琴树脚下。”字

岭南三家笔下的古琴书写，是诗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的人琴互文的自我形象表达。以琴为媒介可以洞察他们幽深隐蔽的精神世界，从对抗到逃离再到平心静气，表现出他们非同寻常的生命张力。世事沧桑巨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岭南三家以艰苦卓绝的生命意识，在入世与出世的交融碰撞中，在琴心与诗心的相互作用下，不断修行，最终与自我和解。

《羊城月夜同王紫诠吴山带次蓝公漪韵》

从诗中可以看出琴既是他的幽居的陪伴，也是他孤高气节的象征。梁佩兰善于操琴，三人中与古琴最为亲近。他在《赠汪苕溪文部》中把琴视为大雅，并作为他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提琴拊弦按官徵，不向大雅当谁导”。甚至在《听唐人弹琴》中他直接将琴声比作“君子声”并予以歌颂，在某种程度上，琴已成为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寓所。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境遇中，岭南三家尽管人生选择和生命历程各有不同，但不约而同在晚年都选择了“含至德之和平”的古琴作为修身之器，琴德与诗心相融，琴境与禅境相通，他们的心境逐渐趋向平和。无论是复明大计理想幻灭的屈大均，还是国破家亡报仇无望的陈恭尹，抑或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梁佩兰，都逐渐化解了内在的冲突与矛盾，并积极与仕清的文人和达官贵人交游往来，诗中的古琴书写也从最初“御琴”的悲凉激愤转为冲淡平和、空灵娴静，他们生命态度的转变是痛定之后对自我的超越，以此抵达生命的圆融境界。

（作者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是2021年度广东省社科基金岭南文化专项“异质同构：岭南古琴文化与岭南诗学传统之关系研究”(GD21LN07)的阶段性成果



琴音 图/视觉中国